

化中看到的令人震撼的東西，看作是一個有着自己節奏和軌跡的文明的內部變化。

本書作為會議論文集，所收各篇論文在選題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更廣泛的亞洲史和世界史的視野中重新思考清代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怎樣在世界歷史時間中定位清代。但是，將清代的形成放進世界歷史的整體維度中進行思考，恐怕仍然需要在從「中」看「西」與從「西」看「中」的雙向時空視角中尋找一種更多元的平衡。這樣的平衡可能需要更多地考慮中國社會的區域性特徵，更多依賴大量深入細緻的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而能夠以中國某一特定區域的深入研究來回應這些大問題、老問題的文章，在本論集中數量並不多。同時，真正拋棄那些含有過多或隱或現的政治隱喻和對某種社會狀態的預設的分期概念，恐怕還需要假以時日。畢竟，在該書中我們並沒有看到一種替代性概念的出現。爭論還將繼續下去，但是，爭論本身至少可以刺激學者考慮使用更開放而非關閉各種可能性的分期標籤來替代諸如「早期現代」這樣的術語。我們應該更多思考的是，作為中國歷史學者，我們該如何以自身的研究參與乃至超越他們的討論！

鄧慶平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劉文鵬，《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4，3，338頁。

本書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疆域形成研究」計劃的專著之一。作者在緒論中指出，學界對清代驛傳系統的研究並不充份，「因襲明代說」雖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並不能反映出清代驛傳系統在「存在範圍、構成內容、管理方式、財政供應等方面」獨有的特點，尤其是該系統在邊疆地區的發展，是其超越明代的特色之一，但以往學界對此關注不多。故作者力圖將二者綜合觀察，復原清代驛傳系統的「動態」運轉過程，考察這一系統在清代政治信息傳遞及疆域形成中的作用。

全書由緒論、七個章節及兩個附錄組成。作者在緒論中對古代驛傳研究的學術史做了簡要的回顧，認為學者們在信息控制這一主題上着力甚多，但對於信息的傳遞過程卻較少關注，而高度發達的清代驛傳系統，正為此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範例。作者同時指出，由於中國古代的驛傳體系主要傳送政

府文書，而近代郵政以傳遞民間信息為依託，基於這樣的分別，他主張把由「驛、站、台、塘、鋪等組成的信息傳遞方式統稱為驛傳系統，而不稱為郵傳、郵驛」（頁9）。第一章主要論述清代以前驛傳系統的發展狀況，作者將先秦、漢唐和宋元明劃分為驛傳系統的「形成雛形時期」、「漸具規模時期」與「趨向完備時期」，認為經過長期的發展，中國古代的驛傳系統最終形成以驛站為主的體系，並具有官員接待、文報傳遞及物資轉運三項功能，但清代基於自身不同以往的政治與軍事需求而重建了規模宏大的驛傳系統。在第二章「清代驛傳網絡的形成」中，作者利用《讀史方輿紀要》、《嘉慶重修一統志》、（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及部份地方志材料，列舉了各省的驛路路線走向及里數。但作者在概述部份地區的地理狀況時，所引用的史料並非理想（如引用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編的《中國分省概況手冊》介紹廣東省的地理概況，但很難從其概述中看出廣東省的歷史地理變遷及對驛傳體系的影響）。另外，作者雖然列舉了每條驛路的驛站名稱及相隔距離，卻未能為讀者展示每條路線各驛站設置的變化情況，難以看出驛傳網絡形成的「動態」過程，也無法體味朝廷在改設路線時的考慮及相關因素的合力影響。

第三至五章主要探討驛傳體系的管理體制、功能和財政供給問題。作者對行省區驛傳管理體系的變革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認為由驛丞專管改為州縣兼管，更能保證驛站夫役錢糧的充足供應和有效運轉，也有利於地方官員的統一管理和調度。而原先對驛傳體系的監察由道員兼管到臬司總核，則進一步加強對州縣驛傳事務的監督，避免了以往騷擾驛站、多索糧馬的狀況發生。在對行省驛傳體系進行改革的同時，在新疆、蒙古、盛京、黑龍江與吉林、西藏等邊疆地區，依據軍事需要、地理狀況和人群職業分佈的不同，由不同職能的官員來進行管理（如新疆主要在滿兵中選取筆帖式管理台站，盛京由富有職業化色彩的驛丁擔任驛丞，蒙古地區挑選貧困的蒙古人傳遞軍報和管理台站事務，西藏地區則多由官員率兵駐紮台站，在傳送文報的同時負責保護驛路、鎮壓番民）。

作者一再強調，驛傳體系是清朝政治信息傳遞的重要方式。為了加快信息傳遞的速度，清朝除了嚴格規定文報傳遞的時限外，也對官員使用驛遞的權力、文報傳遞路徑的選擇進行煞費苦心的設置。在保證傳送速度的基礎上，提高公文在傳遞過程中的安全性成為另一重要問題，清朝對上行下達的文報實行嚴格的釘封制度，並在遞送過程中嚴格核查，要求接遞的驛站在火票上留下詳盡的紀錄。在邊疆地區，尤其是發生戰事的時期，保護驛傳體系

的安全則直接關係戰事的成敗，因此清朝在經歷多次邊疆的戰事後逐漸形成了「大員護驛」的慣例，保證邊疆台站事務的正常運轉及這些地區安定局面的逐步形成。

明末派諸民間沉重的驛傳差役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給清初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也推動了清初郵傳差役由僉派到雇募、由民當到官當的變革。在徵集和使用驛傳經費方面，作者認為中央採取了各地「因地制宜」的原則，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本省驛傳財政政策，但對於各州縣而言，由於差役繁重而驛費短缺，往往給當地百姓造成沉重負擔；儘管有官員爭取鄰近無驛州縣的協濟，也通過放租驛站莊田來收息，試圖解決驛費問題。不過綜觀論述驛傳財政的章節，作者僅選取了雲貴地區作為分析對象，也沒有就「攤丁入畝」、「改土歸流」等背景做出更詳盡的分析。事實上，驛費開支一直是清朝在財政結構中頗為棘手的問題，因為其不僅涉及如何向民間徵收、起解、使用，又與官場的腐敗、勾結相關，因此在這一問題上還有相當的空間可供挖掘。

雖然驛傳體系在清朝政治運轉中發揮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清朝的政治運轉本身也在不停地消耗和破壞着驛傳體系。作者在第六章「清代驛傳系統的困境及其近代變革」中指出，官員、外藩和軍隊對驛傳系統的騷擾、侵貪、濫用，嚴重影響了驛傳系統的效率和安全性。皇帝個人素質的優劣、管理機制的矛盾（驛站官員的參奏權與督撫對主管省份驛傳的絕對支配權）及國家近代化的要求，使得驛站的功能逐漸被電報和近代郵政所取代，最終導致「裁驛設郵」的結果。不過，「裁驛設郵」在地方如何具體操作，該著並沒有繼續展開。依據不少地方志的記載，即使在清朝宣佈設立國家郵政後，不少地區依然保留着相當數量的驛站，而國家郵政在當地的代表，往往托由某些商鋪或者機構代辦。如何理清這一時期較為複雜的驛傳與郵政的並存局面，尚需更多細化的研究分析。

在本著的最後一章〈清代驛傳系統的作用及其與疆域形成之互動關係〉中，作者認為結構清晰、分工明確的清代驛傳系統，支撐了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和皇權高度專制的清王朝。在疆域形成的作用中，驛傳系統保證了戰爭期間的信息傳輸以及朝廷和地方的有效聯繫，作者選取了東北驛傳對防禦沙俄的作用、台站對疆藏歷次重大戰爭的影響作為分析，指出驛傳系統只有保持穩定與迅速，才能保證清朝順利貫徹其治邊政策和保持邊疆地區的穩定。

縱觀全書，作者依據《清會典》、《清會典事例》、清代的奏摺檔案、地方志、清人文集筆記遊記等材料，對清代驛傳系統的形成、運作、管理、

驛傳路線的設置、驛傳體系與中央政治之間的關係等方面的具體問題，較之以往以歷代郵驛制度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更為具體與深入，對了解清代文報傳送、清代信息交通與政治運作、清代驛傳體系的具體功能等問題都有參考的意義。但該著亦有較明顯的不足，由於選取整個清朝的驛傳體系作為研究對象，難以兼顧各地區不同時期的差異情況，因此也難以看出制度「動態」運作過程中的地方差異。作者雖然選取了部份地區作為個案，以圖勾勒條文制度在具體運轉中的細節，卻沒能意識到各地區操作的差異和代表性；著者雖想考察清代驛傳與疆域形成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但卻只在最後一章草草論述驛傳體系在保證邊疆穩定及與政權聯繫方面的作用，看不到驛傳體系到底如何在兩百多年中具體影響清代的疆域變化與形成，這是全書最令人遺憾的地方。

吳昱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90頁。

以往學者們從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不同學科對不同歷史時期區域性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常建華教授近期出版的《明代宗族研究》一書，作為第一部研究明代宗族問題的專著，其特色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打通了思想與社會的聯繫，即整體把握宗族祠廟祭祖形態的演變、鄉約推行與宗族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大夫的觀念形態與宗族組織化、制度化的關係（頁7），有別於以往學者們從經濟和政治功能角度對宗族組織建設的探討。

從該書的結構佈局上看，除了引言、結論和附錄外，正文部份共三編。上編從制度與社會的關係角度，以明代祠廟祭祖為核心，從時空上把握安徽徽州府、福建興化府、江西吉安府祠廟祭祖的階段性變化和地域特點，及其與明代祭祖禮制的關係，形成本編四章的結構，較之不分區域的斷代性宗族研究，更加深入。中編將宗族的組織化與族規的興起置於明朝推行鄉約的背景下研究，提出了宗族鄉約化的概念。下編集中探討明初宋濂、楊士奇和明中後期羅欽順的宗族思想及其參與宗族建設的實踐，反映了明代士大夫與新宗族形態的關係。從三編的邏輯關係上看，上、中兩編從宗族文化本身出發，通過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宗族祠廟祭祖和族規等內部生活的比較，反